

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

Sixty Years of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Areas of Shenyang

报告卷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辽海出版社

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

报告卷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报告卷 /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80711-922-7

I. 沈… II. 沈… III. 考古发现—研究报告—沈阳市
IV. K872.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8289 号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沈阳解放 60 年来考古调查与考古发掘报告、简报等资料性文章共 82 篇,分为沈阳解放 60 年来考古发现概述和资料性文章两大部分。文章集中反映了 60 年来沈阳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成果。作者是 60 年来在沈阳地区从事过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的考古工作者。

本书可供沈阳地域性考古学文化和沈阳地方史研究,以及其他考古学、历史学研究者参阅。

责任编辑:于文海 陈晓玉

封面设计:栗娜

版式设计:张杨

责任校对:魏运佳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电话:024-23284588

E-mail: dszbs@mail.lnpgc.com.cn

http://www.lhph.com.cn

印刷者:沈阳市华天印务中心

发行者: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210mm × 285mm

印张:32.5

字数:800 千字

印数:1—1500 册

出版时间: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30.00 元

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概述

姜念思

沈阳是辽宁省省会，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现辖和平、沈河、铁西、大东、皇姑、东陵、于洪、苏家屯、沈北新区等9区和新民、辽中、法库、康平等4县(市)，总面积1.3万平方公里，人口720万。沈阳地处东北大平原的南部，辽东半岛的北端，地理坐标东经122° 25' ~ 123° 48'，北纬41° 12' ~ 43° 02'，正位于辽东与辽西、辽东半岛与东北大平原的连接点上，自古以来就是文化的交汇之地。全区地势由东北向西南缓缓倾斜，西南部属于辽河、浑河的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山地丘陵集中在东部和北部，东北部的辉山丘陵，林深树茂；城区南部及法库和康平两县也有部分丘陵山地。境内有辽河、浑河及其支流蒲河、秀水河、柳河、养息牧河、沙河等河流。从原始的时代起，人类就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但是，因为地处边陲，加之文献记载的缺乏和历代战争的破坏，沈阳地区的早期历史，并不为人们所了解，所以，考古发现对于沈阳来说显得格外重要。

解放以前，沈阳地区无所谓考古工作，只有日本人在沈阳做过零星的考古调查，在南湖公园和塔湾、砂山等地清理过几座汉墓和辽墓。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当解放战争的炮声还没有停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其下设的东北文物管理处就从哈尔滨迁到沈阳，揭开了沈阳文物考古工作的崭新篇章。不久，省、市文物管理和考古发掘机构相继建立，开始有计划地开展沈阳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解放60年来，考古工作者配合国家基本建设和文物保护，开展了大规模的文物普查、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共发现各时代各类文化遗存1100余处，清理发

掘古代城址、遗址、墓葬、窖藏等近百处，不仅为国家保护了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物，也为研究沈阳的历史获取了大量难得的第一手资料。60年的考古发现证明，沈阳历史悠久，早在数万年前旧石器时期晚期起，就已经有人类在此活动，7000多年前，“新乐人”成为沈阳地区最早的居民，形成了最初的原始聚落。约在2300多年前，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首先在今天的沈阳老城区修筑了城郭，正式将沈阳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在尔后的两千多年漫长岁月中，虽然城池在民族的纷争和朝代更迭的战火中几起几落，但文明的火焰始终没有熄灭。沈阳城也由最初的军戍小城，逐渐发展为县城、州城、路城、卫城，最后成为清朝的开国之都。古代以肃慎、秽貊、高句丽、鲜卑、靺鞨、契丹、渤海、女真、蒙古、高丽、回族、满族、锡伯、朝鲜等名称出现的众多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为开发沈阳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沈阳地上、地下遗存的丰富文物，便是这一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有力见证。在沈阳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在沈阳解放60周年到来之际，回顾和梳理60年来沈阳的考古发现，盘点其学术成果，不仅有助于今后的文物考古工作，而且对于深刻认识沈阳古代历史文化的特点、继承其优秀的文化遗产，建设文化强市，也有重要的意义。

—

沈阳地区的原始文化，新中国成立前还一无所知。沈阳解放60年来，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尽管至今沈阳地区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

和石器地点,但已经有了很重要的线索。1957年在康平县发现了哺乳动物猛犸象和四不像鹿的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鉴定,发现在四不像鹿的第一分枝“第一小枝尖端两面,都有很细的磨刮的痕迹,角的近端断面整齐,有经砍割的一圈斜面,显然是人工凿磨的结果”^①。2008年3月,康平县两家子乡田家村一村民在打井时,于地下10米深处发现披毛犀化石,在下颌骨化石上也明显有人工凿磨的痕迹^②。这两处发现证明,至迟在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沈阳地区已经有了人类活动。

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1956年,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首先调查了新民县偏堡子遗址,确认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遗址。1973年6月,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调查了新乐遗址,同年10月进行了试掘,发现了上下两层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下层属于新石器文化,年代要早于偏堡子遗址,后来定名为“新乐文化”;上层属于青铜时代文化,定名为“新乐上层文化”。在1980年至1982年的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中,在康平县(时属铁岭市管辖)发现了几处红山文化遗址。

1. 新乐文化

新乐文化是沈阳地区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遗址最先发现于新乐电厂宿舍而得名。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城北新开河北岸的台地上,面积约17.8万平方米,中心区域约2.25万平方米。1973年发现并进行了试掘,其后到1993年又先后进行了四次发掘^③。五次发掘共发现下层房址40余座,分布在东西长600余米、南北宽50~80余米的狭长地带内。其中3座大型房址位于遗址的中心部位,每座面积都在100平方米左右,呈不规则的“品”字形排列,周围穿插分布一些中小型房址,房址之间相距不足3米。房址皆为半地穴式,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或方形,中部有火膛,有的多达2个以上。部分房址内发现有柱洞,有的柱洞多达三层。门道为斜坡式,多在东壁或南壁,但也有的

房址未发现门道。

新乐遗址下层出土的遗物主要为石器和陶器。石器有磨制、打制和细石器三大类,其中细石器数量最多,约占40%,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的数量大体相当。打制石器中以敲砸器、刮削器占多数,其次有网坠、铲等;磨制石器以镞的数量最多,另外有磨盘、磨棒、研磨器、刀、镑等;细石器中石叶、镞、尖状器占绝大多数,此外有刮削器、石核等;石叶多无第二次加工,石镞只在腹面作第二次加工。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约占陶器的90%,少数有黑色者,泥质陶极少。陶器皆为泥片贴筑,火候较低,胎质较疏松。器形单纯,以大口小平底深腹罐为主,约占整个陶器的90%左右。另外有簸箕形斜口器、高足钵、碗等。陶器表面多饰压印纹,以压印“之”字纹、弦纹为主,其次为压印篦点纹、锥刺纹,素面者极少。深腹罐口沿下一般都有一周凹带纹,内饰压印斜线纹、三角纹等;器身满饰压印“之”字纹,多为竖压横排,也有少数横压竖排“之”字纹与竖压横排“之”字纹同施于一器者。有部分深腹罐通身饰压印弦纹。斜口器的“之”字纹则仅饰于斜口之下和口沿边缘,外鼓的背部一般不施纹饰。

除石器和陶器外,在每座房址内都出土有煤精制品,主要有圆泡形、耳珥形、圆珠形等几种,造型复杂,制作精细。另外还出土了玉串珠和玉斧等玉器,以及赤铁矿和石墨的碎块,且都有摩擦使用的痕迹。在大型房址F2内还发现了一件炭化的鸟形木雕制品和炭化谷物、果核、榛子壳等。炭化谷物经鉴定与东北大葱黍(大黄米)相似^④。骨器与兽骨发现不多,仅发现少量猪、羊或鹿等食草类动物的骨骼,可能与土质多酸性、保存不好有关。

上述发现表明,新乐遗址是一处定居的原始聚落,已有原始农业,但渔猎在生活中仍占相当大的比例。鸟形木雕制品有研究者认为可能属于权杖一类,据此推论,“新乐人”很可能是以鸟为图腾。煤精制品可能与原始占卜有关。细石器的大量出土证明,细石器并非像以

往所认识的那样仅与游牧经济有关,也与定居的农业和渔猎经济相联系。

根据 14C 测定,新乐址距今 $6800 \pm 145 \sim 7245 \pm 165$ 年(经树轮校正)。独特丰富的文化内涵表明这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它的发现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一次历史性突破。新乐遗址的重要发现报道后,立即受到国内外考古界的重视和关注,被定名为“新乐文化”。

新乐遗址发现之后不久,又相继在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发现了兴隆洼遗址,在阜新市发现了查海遗址,在大连长海县发现了小珠山等遗址,在丹东发现了后洼遗址。这些遗址都以深腹罐和压印“之”字纹为主要特征,说明它们之间当有一定的文化联系。从深腹罐的形制与纹饰来看,新乐与兴隆洼及查海更为接近,但新乐的年代要晚于上述两个遗址,而且新乐的深腹罐做得更规范,“之”字纹压印得更细密,可见新乐文化的深腹罐应来源于兴隆洼文化。大连小珠山下层和丹东后洼下层均稍晚于新乐文化,深腹罐多含滑石,“之”纹数量减少,而且做法也不如新乐规范,应该是受到过新乐文化的影响。

新乐遗址出土的斜口器是一种器形很独特的器物,其功能推测是用来保存火种的。与此相似的器物还发现于辽西的红山、富河和小河沿文化,在吉林左家山遗址中也有出土^⑤。但上述文化的年代都晚于新乐文化,说明它们的斜口器可能源自新乐文化,由此可见新乐文化的广泛影响。

2. 偏堡子文化

偏堡子文化最早发现于新民市偏堡子,1956 年东北文物工作队仅进行过地面调查和采集^⑥。遗址坐落在辽河以东 10 公里的沼泽地中的沙丘上,文化层厚 20~40 厘米。采集的陶器有深腹罐、四耳罐、高足钵等;石器有磨制的斧、镑和细石器。1965 年 5 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队在铁西区肇工街遗址的试掘中,发现这类遗存被叠压在郑家洼子青铜时代遗存之

下^⑦。以后,在新乐遗址和新民高台山遗址,也都发现了这类文化的地层关系:在新乐遗址,它处于上下层文化之间;在高台山遗址中,它位于新乐下层文化之上、高台山文化之下。另外,在新民、辽中、东陵区等地,也都发现了偏堡子文化遗址^⑧。从沈阳地区目前发现的材料看,偏堡子文化遗址的文化层都比较薄,但文化特色却非常明显。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夹滑石红褐陶、灰褐陶亦占一定数量。陶器皆为手制,火候较高,器壁较薄,表面均经压光,造型规整,有的涂一层红陶衣。器型有深腹罐、高足钵、短颈长圆腹壶等。深腹罐口沿多外折或附贴成叠唇。大部分陶器有纹饰,以竖行泥条附加堆纹与几何刻划纹最具特色。竖行泥条堆纹皆挤压或捏成绳索状泥条,等距离地附加在器腹的上半部;有的条状堆纹的下部边缘又饰一圈稍粗的泥条。几何刻划纹以平行斜线组成菱形、弓字形、三角形、回字形、人字形等纹饰,内填细密的斜线纹。此外还有弦纹、网格纹、篦划纹、叶脉纹、刺点纹和涡纹等。罐的口沿外侧多饰附加堆纹或划纹,壶的颈部往往饰绳索状附加堆纹。石器主要为磨制,少量为打制,亦有细石器,器形有刀、凿、磨盘、磨石、环刃器、砍砸器、矛形器、镞、网坠、球和石片等。

据 14C 测定,偏堡子文化距今约 5000 年。从敞口深腹罐、高足钵以及刻划纹来看,当与新乐下层文化,特别是与东高台山遗址二期(新乐文化晚期)有明显的承袭关系。但叠唇鼓腹罐和陶器属滑石粉、竖行泥条堆纹的出现却是新的因素,目前在沈阳地区还找不到它的源头。陶器含滑石粉是大连地区和鸭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固有的因素,而三角状复线划纹和泥条附加堆纹在大连小珠山中层文化、本溪马城子文化^⑨、东港市石佛山、岫岩县北沟以及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堂山^⑩等遗址中都有发现。1992 年发掘的瓦房店市长兴岛三堂村遗址,发现了与偏堡子遗址同属一个文化类型的三堂一期^⑪。从文化面貌来看,三堂一期要早于偏堡子。近年,在内蒙古扎鲁特旗也发现了偏堡子文化的遗

存,可见该文化分布之广泛。有学者提出“所谓‘偏堡子类型’,是辽东半岛南端含条形堆纹陶器遗存向下辽河平原逐步发展,与该地区固有文化因素相融合并受到鸭绿江下游及邻近地区文化影响而形成的”^⑫。亦有学者认为偏堡子文化的附加堆纹因素应该是受到来自西部邻近地区小河沿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⑬。也有学者认为偏堡子文化可能受到山东半岛北辛文化的影响。

3.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于辽西和内蒙古赤峰地区。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全省文物普查中,在法库县的叶茂台,康平县的砂金乡敖力营子、二牛乡李家、郝官屯乡六家店等地都发现了一些彩陶遗址,其文化面貌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相似,应是红山文化晚期向东北流布的一支^⑭。

二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沈阳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有许多重要发现,根据目前的资料,沈阳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大体可以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距今 4000 ~ 3100 年,约相当于中原的夏代到商代末期;晚期距今 3100 ~ 2300 年,约当西周初到燕国设五郡之前。早期主要有高台山文化和新乐上层文化,晚期主要是郑家洼子文化。除此之外,经过发掘的属于青铜时代的遗址还有康平顺山屯、法库湾柳遗址、苏家屯老虎冲等,它们应归属于何种文化,目前还其说不一,难以定论。

1. 高台山文化

高台山文化 1973 年发现于新民高台山。高台山是由东高台、腰高台和西高台三座小山组成。当年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配合基建工程,在腰高台山清理了 7 座墓葬,翌年又发掘墓葬 5 座,并对东高台山遗址区进行了调查。1976 年,沈阳市举办文物考古短训班,配合教学实习,在腰高台山又清理墓葬 13 座,同时对东高台山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1979 年和 1980 年又

在东高台山发掘 750 平方米,发现灰坑 8 个、墓葬 60 座^⑮。

五次发掘结果表明,高台山是一处包含上中下三层不同时期文化遗存的古代遗址。下层属于新乐文化,中层属于偏堡子文化,上层属于青铜时代文化,而以青铜时代文化为主。初发现时认为属于“新乐上层文化类型”,后改用“高台山类型”,1983 年后,开始使用“高台山文化”这一命名^⑯。

高台山遗址发现的墓葬排列密集,皆为圆角长方形土坑竖穴式,大型墓发现有二层台和木棺痕迹。骨架多已腐朽无存,从少数保存的牙齿及部分肢骨辨认,葬式多为单人侧身屈肢葬,也有直肢葬,头向不一,多为头北足南。随葬品置于下肢附近,多为一壶一钵,且钵皆覆扣于壶上;少数还随葬有罐、碗、陶纺轮、石器等,反映了这种文化独特的葬俗。居住址出土的陶器与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在陶质及制法上基本一致,而在器型上却迥然有别,主要有鼎、鬲、甗、甑、壶、罐、碗和纺轮等,三足器的比例较大。

高台山遗址的陶器以夹砂红陶、红褐陶为主,多为泥条盘筑,间有泥片接筑,小件器以手捏制。火候较高,陶质坚实,表面多施有红陶衣并磨光,有的可见明显的磨压条痕。口沿多在内侧抹斜成尖唇,有的向外“回泥”形成外叠唇。陶器以素面为主,纹饰仅有少量划纹、椎刺纹和附加堆纹。但器耳较发达,种类有桥状耳、鋁耳、瘤耳、盲耳等。竖桥状耳有时与鋁耳配合使用。壶多桥状耳,钵多乳状耳,罐多扁状瘤耳。陶纺轮出土数量很大,形式多样,除常见的扁平式外,还有馒头形、算盘珠形和断面作梯形等多种。石器多磨制,常见有梯形或扇形扁平斧、半月形或长方形双孔刀以及铲、镞、剑、棍棒头等。

高台山遗址未发现房址,仅在东高台山发现一座陶窑。窑室平面略呈方形,正南北向,只存西北角窑室内壁。草拌泥窑算厚约 12 厘米,算孔直径约 3 厘米。窑底南高北低,有三条放射状火道。

沈阳地区经发掘的属于高台山文化遗址还有新民公主屯后山。公主屯后山遗址位于新民市公主屯村北的台地上,东西宽 250 米,南北长 350 米。秀水河从西北方向流来,经遗址的北、东两侧坡下流过,遗址高出河床约 7 米。该遗址经多次调查,发现内涵丰富,有高台山文化、郑家洼子类型、战国及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1980 年 7 月,对遗址进行了试掘,发现高台山文化灰坑 7 个、墓葬 3 座、房址 1 座。房址为长方形半地穴式,东南角有门道,有二阶梯通向门外。在靠近房壁处发现柱洞 3 个,分别位于北壁中部、南壁中部和西南角^{①7}。1988 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在属于高台山文化的彰武平安堡遗址发现的房址均为圆形地面建筑,有的房址中央有两个主柱洞对称分布,四周有沟槽,并发现了长方形土坯,推测应有土坯结构的承重墙^{①8}。

从目前发表的资料看,高台山文化主要分布在以辽河支流柳河流域为中心的辽北地区,东不过辽河,西达医巫闾山,东北抵法库、康平。高台山文化的年代,经 14C 数据分析,在距今 4355~3335 年之间,证明高台山文化是辽河下游地区一支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它的起始年代可能与分布于医巫闾山以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大体在夏代至商代早中期;二者有一个平行发展的阶段,而且两种文化曾有过密切的接触和相互影响。在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出有高台山文化的陶器,在敖汉范杖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存在高台山文化的墓葬区,在阜新平顶山高台山文化墓葬中出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器^{①9}。这两种文化的微妙关系值得我们注意。而在晚期,高台山文化的影响力可能更深远一些,是辽西地区魏营子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主要来源^{②0}。高台山文化对辽河以东的新乐上层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至于高台山文化的来源,目前尚不清楚,有人认为彰武平安堡二期应是高台山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②1}。

2. 新乐上层文化

新乐上层文化是 1973 年首先发现于沈阳新乐遗址上层因而得名的一支早期青铜时代文化,主要分布于浑河流域。目前在沈阳地区已发现新乐上层遗址 40 余处,多位于沈阳城区的北部,特别是从北陵至塔湾一线、新开河两岸的台地上较为集中。除新乐遗址经发掘外,近年来,配合基本建设,又对辽宁大学遗址、百鸟公园遗址、千松园遗址、道义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②2}。从目前的资料看,新乐上层遗址的面积都比较大,但堆积却较薄,发现的遗迹多为灰坑与沟,出土多陶器碎片,伴随草拌泥红烧土碎块,完整器极少。房址只在道义遗址发现 4 座,F1 平面近直角方形,门南向;F2 因被灰坑打破,只见圆形灶和四个柱洞;F3 平面近圆角长方形,四周有 8 个圆形柱洞;F4 因被 F2 叠压,只见两个柱洞^{②3}。

新乐上层文化的墓葬发现也不多,目前只有三个地点发现过墓葬:一是 1979 年 7 月在新乐遗址北部高岗上,发现墓葬 10 余座;二是 1982 年在辽宁大学家属宿舍院内,数目不详;三是 2005 年在“建赏欧洲”(原电校)工地,发现 2 座^{②4}。这十几座墓葬,除一座瓮棺墓外,其余均为单人土坑竖穴墓,有的有二层台,葬式为侧身屈肢葬,头向有南北与东西两种。墓内随葬品较少,一墓仅 2~3 件,有壶、罐、杯、纺轮、石斧等。

新乐上层文化石器以磨制为主,少见打制,有斧、刀、杵、锤、棍棒头、磨棒、磨石、镢、铲、镞等。陶器亦属夹砂素面红褐陶系,典型器物有鼎、鬲、甗、甑、碗、盆、罐、壶、豆等,多桥耳和釜耳。有些器型和文化特征与高台山文化颇为相似,但新乐上层以鼎为主要炊具,其次为甗,鬲较少见;而高台山以鬲和甗为主要炊具,少见鼎。目前学界多认为二者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在新乐遗址出土一件扇形青铜斧和一件环首铜刀(残);在属于新乐上层文化的抚顺市郊的望花和施家东遗址出土两件青铜刀;在法库叶茂台西山遗址附近采集到一件扇形青铜斧滑石范^{②5}。新乐上层文化经 14C 测定,距今 3370 ± 90 年,略晚于高台山文化,因此

受高台山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有学者认为,新乐文化“可能就是高台山文化的后续文化”,“可能是青铜时代从辽河流域到吉黑地区的一个中间环节”^{②6}。

3. 顺山屯文化类型

顺山屯文化类型是因首先发现于康平县顺山屯遗址而得名。遗址位于康平镇郊西泡子水库东岸的台地上,东北距康平县城 1.5 公里,1973 年发现,1977 年复查并试掘。试掘面积 70 余平方米,发现房址 3 座、灰坑 10 座、墓葬 14 座(包括被建设施工破坏的 4 座)。房址均为椭圆形半地穴式,直壁,壁上抹有草拌泥并加火烘烤。地面平整,系用黄砂土砸成。房址四周及中部共发现 7 个柱洞;中部有一灶址,系用三堆黄土围成马蹄形。14 座墓葬除一座小孩高棺葬外,均为土坑墓或散葬墓,未见葬具。有三座为合葬墓,其余为单人墓,葬式不一,屈肢葬较多,也有直肢葬、俯身葬。方向不一,随葬品多少不同,其中有一半左右的墓未见随葬品。

顺山屯遗址出土陶器均为夹砂陶,且以粗砂陶居多。以褐色为主,其次为灰色,还有少量红陶。除少数鬲、罐的颈部有一周指压痕的附加堆纹外,不见其他纹饰,个别陶器上有一层红陶衣。器耳异常发达,尤以竖桥状耳、釜耳及盲耳为最常见。其典型器物有鼓腹、圆腹鬲、单把高领罐、敛口扁腹罐、双桥耳高领罐、钵式鼎、敛口钵、单孔或多孔甗等,不见甗和豆。墓葬随葬品有鼎、鬲、簋、罐、盆等。石器有铈、刀、斧、磨盘、磨棒、研磨器、砺石、镞、纺轮、玉饰件等。骨器有椎、针、镞、筭、珠等,另外还出土卜骨 8 件,有灼无钻。在遗址附近还曾采集到三棱形铜饰件和铜耳环^{②7}。

顺山屯文化类型的分布范围尚不清楚,目前发现的遗址都在康平和法库境内。顺山屯遗址的房址、灰坑、墓葬之间都有叠压打破关系,所以可分为早晚两期。顺山屯遗址的 14C 测定有两个数据:下层房址 F1 距今 3350 ± 90 年,树轮校正为 3595 ± 135 年,上层房址 F2 距今 2960 ± 90 年,树轮校正为 3110 年,可见其年代与高台山文化和新乐文化年代也大体相当。顺山

屯遗址有的将其归入高台山文化,近来又有人将其划入马城子文化^{②8}。顺山屯虽与上述两种文化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陶器和葬俗都有自身的特点,所以暂以类型称之为宜。

4. 湾柳遗址

湾柳遗址位于法库县丁家房乡湾柳街村东南的漫岗台地上,1979 年发现。遗址范围东西宽约 300 米、南北长约 500 米,但因丁家房砖厂在此取土,使遗址遭到破坏。铁岭市博物馆曾作过多次调查,并征集了部分文物;1986 年,又进行了勘探和小规模试掘。1988 年,辽宁大学历史系又在此进行考古实习,揭露面积 516 平方米。两次发掘共发现灰坑 10 个、墓葬 1 座。墓为土坑竖穴,头东脚西,腰部左侧随葬陶钵 1 件。

湾柳遗址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其次是夹砂红陶和夹砂褐陶。以素面为主,纹饰主要有附加堆纹和压印刺点纹。附加堆纹施于器物的腰部、颈部和器耳上下方,压印刺点纹施于器物颈部和器耳上下,主要起加固和装饰作用。另外还有少量划纹和圆形泥饼。其代表性器物有鼎、鬲、甗、罐、钵、碗、甗、盆、瓮、杯、壶、勺、豆等,不仅器物种类繁多,而且各类器物的形制也比较复杂。器物的足和耳尤为发达,就鼎足而言,就有圆锥、方锥、扁柱等形式,器耳有桥耳、瘤耳、鸡冠耳;既有实用的耳,也有仅具装饰意义的假耳(盲耳),既有横耳,也有竖耳。除少数器物作对称的双耳或四耳外,多为三耳。陶纺轮也多种多样。除石器与陶器外,还出土了几块有刻划痕迹的猪骨碎片。尤为重要的是,湾柳遗址还出土了青铜器 9 件,都是砖厂推土机推土时发现的。其中铃首刀 1 件、鹿首刀 1 件、环首刀 1 件、柄端穿孔刀 2 件、板状斧 1 件、有銎斧 1 件、戚(或称有銎斧)1 件、镜 1 件^{②9}。这些铜器都具有北方式青铜器的特点,与新民大红旗出土的几件相似。但从遗址中出土的 3 件陶范(均残)来看,也不排除自身铸造的可能性。湾柳遗址据 14C 测定,其年代距今 3150 ± 80 年,树轮校正为距今 3340 ± 150 年,大约在商周之际。从文化面貌看,湾

柳遗址与高台山文化和新乐上层文化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其自身的特点亦很明显,发掘者认为可能属于另一种文化类型;而近年的研究者有的把它归于高台山文化,也有的把它归于新乐上层文化。

5.老虎冲遗址

老虎冲遗址位于沈阳市苏家屯区陈相屯镇沈阳市储运公司红砖厂院内。地处沙河南岸,属于丘陵地带中的凹地,当地俗称为“老虎冲”。遗址南北长50米,东西宽20米。1978年6月,红砖厂在取土时发现但破坏了遗址。沈阳市考古队于1978和1979年进行了两次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出南北一线排列的以青灰膏泥填充的灰坑9座,可以分为圆形、椭圆形和圆角长方形几种。每坑直径大小不一,大者约2米,小者约1米,深浅在0.35米~1.6米之间。每个坑内都出有木头,H1坑内用木拌子搭成五层“井”字形木构架。多数坑内都出有陶器,共出陶器13件,另外还出土陶纺轮1件、木镰1件。陶器均为手制,以夹砂红褐陶和夹砂黑陶为主,也有夹砂红陶。器形有罐、壶、甗、鼎等,多横桥耳,也有圆柱状竖桥耳和盲耳^⑤。

老虎冲遗址发现的9个青膏泥灰坑非常特殊,其性质还不清楚,有人推测可能与祭祀有关。类似老虎冲的遗址目前在沈阳地区发现不多,总体文化面貌尚待进一步工作和研究。但从出土的陶器看,其特征显然有别于沈阳地区已发现的其他青铜时代文化。其夹砂红褐陶甗和双耳壶属于高台山文化,而耸双横桥耳的曲颈垂腹平底壶、罐,则与辽南的“双房类型”的特点相似^⑥,所以当时把它作为沈阳青铜文化的一个新的类型——“老虎冲类型”^⑦。近年来,有人将老虎冲视为双房类型的遗址材料,又有人将老虎冲遗存作为“双房文化”的晚期阶段^⑧。但据14C测定的数据,老虎冲遗址的年代距今3500年左右,其时代的上限已跨入商代纪年,应属于青铜时代早期文化。

6.郑家洼子文化

郑家洼子文化以最早发现于铁西区郑家洼子而得

名。郑家洼子地势低洼,多沼泽,整个遗址分布于沼泽旁的土脊上,在南北长约1公里的范围内,共发现4个地点,总面积约7万平方米。1958年,在北边的第一地点(肇工街)距地表1米以下发现陶罐1件、青铜器27件,包括短茎曲刃短剑1件、T字形剑柄1件、十字形节约10件、带钮镜形饰9件、双月形饰4件、凿2件、斧1件。同时在附近又采集到1件残弧背铜削。1962年又在第一地点以南500米处出土1件曲刃青铜短剑^⑨。196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在肇工街和郑家洼子一带做了调查,1965年又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在郑家洼子遗址下层发现了青铜时代文化层和2座土坑墓,文化层中出土的石器除刀、镰、棍棒、枕状器外,还有斧、锥、鱼钩等的石范各1件。陶器以黄、红、灰色夹砂陶为主,器形有豆、壶、碗、罐、纺轮、网坠等,其中以深腹罐、小口长颈壶、深盘豆为典型。陶器多素面,仅见三角几何纹与人字纹;半环耳较普遍。土坑墓平面均作不规则的长方形,1号墓已破坏,2号墓头骨向西北,侧身屈肢,腰部右侧佩曲刃青铜短剑1把(残)、石枕状器1对,足下置长颈陶壶1件;在填土中还发现陶纺轮1件^⑩。

同年8月,辽宁省博物馆和沈阳故宫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又在第三地点发掘墓葬14座。14座墓葬分为南北两区,北区为密集排列的12座小型土坑墓,相距80米的南区是单独埋葬的两座大型土坑墓。位于南区的6512号墓为大型土坑竖穴棺椁墓。墓挖在生黄土层中,为不规则的长方形,长5米,宽3米,方向280度。墓底置木椁1具,以方木排列,椁底见有席纹,椁与墓壁之间填土夯实,椁内偏北处置木棺1具。棺椁之间放置大量随葬品:棺西置一剑棱,内放曲刃青铜短剑2把,铜镜1面,铜簪、骨簪各一对;棺北置弓囊,内有弓两张、箭一束71支,弓弭以骨片制成,箭镞为三棱形铜镞;棺东置3件陶壶;棺南放置4套马头用具。棺内人骨1具,系老年男性,头西足东,仰面直伸。头上脚下各立一面大型铜镜形饰,身上按等距离放置4面略小的

铜镜形饰;从镜形饰上锈结的麻布痕推测,当时是用衣物或麻布包裹。头顶有铜簪和骨簪,头上戴小石串珠,颈上胸前佩戴大石串珠,右腰佩青铜短剑1柄,有外套铜鏢的木剑鞘;右膝旁置刀囊和斧囊,内放刀、锥、斧、凿等;髌骨以下、胫骨四周以及脚骨上排列着铜泡,当是靴子上的饰件。在脚骨左侧还有一束98支箭。棺内随葬品有些是死者佩戴的饰品,有些是生前的用具和兵器。此外,在墓的东侧边圻处出有牛骨,当为祭肉。南区的659号墓的形式与6512号墓相似,但随葬品仅有牛腿、陶壶1件、骨环1件和骨剑1把,未见青铜器。郑家洼子北区的小型墓无木质葬具,随葬品极少,一般仅有陶壶、纺轮、石串珠等。这应当是社会关系分化较深的一种反映^⑥。

郑家洼子6512号大墓共出土铜、陶、石、骨等随葬品42种797件,是辽宁式曲刃短剑文化墓葬中规模最大、出土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随葬品中以铜器占多数,分为兵器、马具和装饰器件。墓葬规模之大、棺槨制度之尊贵,以及随葬品之丰富,都表明墓主人是该文化的显贵阶层和首领一类人物,“可能已具王者身份”^⑦。但从其随葬品多马具和兵器来看,又体现出武士的形象和狩猎人风格,而从头到脚放置的大小6面镜形饰件等装束来看,好像又具有巫者的身份。

郑家洼子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均为带短茎的B型剑;T字形剑柄有一种是“混合材料”制作的,其他仍为木柄,与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相似,但从墓葬形制、葬俗、随葬器物考察,又与十二台子多有不同^⑧。郑家洼子的陶器除夹砂陶外,已出现泥质灰陶,并以灰陶长颈壶为主,且不见石椁墓,全部为土坑墓,显然受到了燕文化的更多影响,时代应晚于十二台营子。郑家洼子出土的三翼釜式镞具有战国早期特征,故其年代可推定在战国早期前后。另外,从1955年沈阳南塔出土的一件残断的曲刃青铜短剑和1957年法库尚志水庫出土的T字形铜柄及兽乳形加重器来看,都晚于郑家洼子^⑨。由此推测,郑家洼子文化类型的下限可能要

晚到战国中晚期、燕国大将秦开却胡之前。

与郑家洼子相同的墓葬,1979年在于洪区大潘乡马贝堡村也发现过。因墓葬遭到破坏,墓葬形制不详。出土遗物18件,有曲刃青铜短剑1把、铜剑鏢1件、铜斧1件、铜凿1件、十字形单钮饰11件、镜形饰1件、磨石1件、枕状器1件。这些与郑家洼子墓葬出土遗物基本相同^⑩。郑家洼子文化类型的房址在新民公主屯后山遗址曾有发现。房址为半地穴式建筑,平面呈长方形,长2.68米,宽2米,残高0.30米。房址的西壁中部有一方形地面灶址,系用草泥堆砌而成。灶的东面留有一个火膛口。房址南壁和北壁的中部各有一柱洞,直径23厘米。房址内发现的陶器与郑家洼子青铜短剑遗址的器物相同,应属于同一文化^⑪。

郑家洼子两座大墓的人骨,经测定属于五六十年老年男性,具有东亚蒙古人种特征,与现代蒙古人和通古斯各组存在着显著的具有种族意义的差异^⑫。

三

沈阳地区战国秦汉时期考古,最重要的收获是沈阳老城区城址的发现和始建年代的确定。按文献记载,辽沈地区最早纳入中原版图的时间,是在战国燕将秦开北却东胡、设五郡、修长城之后^⑬。从清代以来,许多历史学家根据文献记载,都把汉代辽东郡属下的候城县推定在沈阳城内或其附近,但沈阳早期城址的发现和确定,却经历了几十年的探索。1958年5月,在南市区(现属沈河区)热闹路热爱里1号院内挖下水井时发现一座战国墓。墓位于地表之下1.8米,墓圻挖在原生沙土层里,墓室平面为长方形,坐北朝南,方向南偏东10度。南部因被房屋所压,未能全部清出,存长2.2米,宽1.1~1.5米,深1.1米。墓内存有棺椁痕迹,椁与棺间距15厘米。人骨已腐朽不存,葬式无法得知,根据墓室现状推测可能为头北脚南单人葬。椁室后端辟有放明器的土龕,出土遗物皆为陶器,龕的中间置一鼎,两

侧各置一壶,鼎前放一盘,盘内置一匱。5件陶器均为夹砂粗红褐陶,表面呈灰褐色;皆为轮制,器形较规整^④。这组仿铜礼器的陶明器的形制,与河北燕下都等地的燕国墓所出基本相同,但其组合为鼎、壶、盘、匱,不见豆,时代可能已到战国晚期,这座墓是东北地区首次发现的战国墓葬,是燕国势力已达辽沈地区的物证。

1980年11月,在大东区四〇一库(新光机械厂仓库)也发现一座战国墓。墓为土坑墓,距现地表1.5米。因已为建筑施工破坏,形制不清。发现的随葬品有喇叭口高把陶豆、三足小陶鼎和弦纹兽耳陶壶,皆为泥质灰陶^⑤。

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沈河区大南街至小南街之间,不断发现汉墓,除少数为土坑墓外,大多为砖室墓。经考古清理的砖室墓有10余座。这些墓皆为长方形,多为夫妻合葬,头北足南。有的有明器台(室),随葬器物大多数是陶明器,此外有琉璃耳珰、铜器、铁器等。从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分析,这些墓葬的年代大体从东汉早期至东汉晚期^⑥。

今天看来,这些汉墓的主人显然都是沈阳城内的居民,但在70年代以前,考古发现并没有为寻找这座古城址提供其他线索。1971年和1975年,在沈阳故宫东路大政殿前和盛京路北侧的沈河公安分局院内挖战备防空洞时,相继发现了古代遗址。故宫遗址破土面积约500平方米,沈河公安分局遗址破土面积约1000平方米。两处遗址文化层均厚达6米,可清楚地看出四个叠压层:第一层为现代表土层,厚约1米;第二层为明清层,厚约1.5米;第三层为辽金元层,厚约2米;第四层为战国汉代层,厚约1.5米。在战国汉代文化层发现一处夯土台基,平面呈凸字形。南北长10米,东西宽8米,最高处存高约3米。出土大量战国晚期的绳纹板瓦、筒瓦及汉代的“千秋万岁”瓦当等建筑构件。另外,还发现古井两口,一口用青砖砌成井壁,另一口用十五节釉陶井圈上下套接而成,陶井井口直径2.1米,残存深度6米。陶井附近出土一只陶罐,罐中满盛战国晚期

的流通货币“一化(一刀)”小铜钱。铜钱以线绳穿系,发现时已锈结在一起,估计约在千枚以上。遗址还出土战国、秦、汉时期的陶器残片、钱币等生活用品^⑦。

沈阳故宫和沈河公安分局仅一路(沈阳路)相隔,两处的地层堆积又完全相同,实为相连的一个遗址。这个遗址面积大,堆积厚,遗迹、遗物丰富,决非一般的聚落遗址;大型夯土台基显然也不是一般的民居,“千秋万岁”瓦当更是官署建筑上才有的构件。这个遗址始于战国至汉代,上面又叠压着辽金元和明清文化层,表明了沈阳古城的悠久历史和沿革。这一重大发现,极大地振奋了考古工作者的精神,人们开始把探寻汉代侯城的目光投向沈阳老城区。但是因为正值“文革”时期,考古工作者不能按程序进行科学发掘,当时对这一重要发现也未予报道,给沈阳城市考古留下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这两次虽然发现了沈阳古城内厚达6米的文化堆积,表明了沈阳城悠久的历史,但因没有发现古城墙,所以还不能确定沈阳在汉代以前已经出现了城郭。所幸,1993年在沈河区原官后里修建“东亚广场(今兴隆大家庭)”时,意外地发现一道古城墙遗址。经省市考古工作者抢救性清理,发现城墙作东西走向,黄土夯筑,为先后三次修筑。第一次修筑的墙体建在原生河沙土上,墙基宽约8.5米,南距故宫北墙约24米,未见基槽遗迹。墙存高约2米左右,顶面呈漫圆形,上面布满了密集的夯窝,夯窝直径8厘米至13厘米不等。在墙的平台转弯处发现一排竖直的圆孔,每个孔的直径约12厘米,孔与孔的间距约15厘米,当是夯筑夹板的木杆所遗留。另外,在附近还发现已腐朽的圆木杆一根,长约1.2米,粗约10厘米。在第一次修筑的墙体的北侧,又发现两次补筑加宽的墙体。第二次是在原墙体的基础上向外加宽约7米,第三次又在第二次补筑的基础上加宽7米。三次修筑的墙体夯层都很明显,每层厚度10厘米至18厘米不等。

根据考古队开掘的三条探沟和施工单位挖掘的一

些建筑坑所暴露出来的遗迹观察,这道墙体断断续续存长约173米(第一次修筑的墙体只发现65.5延长米),而最西端可看出墙体向南拐弯的迹象,证明此处正是城墙的西北角。另外,在墙体的北侧,还发现了护城河的遗迹,从而证明,这次发现的这道墙体是城址的北墙的西段。从墙体西北角向东约120米处,发现大量经火烧的草拌泥及瓦片等,分析这些遗迹可能是城门楼因火烧倒塌所形成的,据此可判断这里可能是北门址所在。如果这种分析不误,那么,城址的北墙长度当在240米左右。在这道墙体内外发现了大量战国及秦汉时期的板瓦、筒瓦、瓦当、钱币及陶器残片,陶器可辨器形有瓮、罐、壶、豆、釜、甗等。在第一次修筑的墙体的外侧(北侧)和第二次修筑的墙体之间,出土的战国遗物就有:铜三棱箭镞、灰陶绳纹半瓦当、黑陶夔纹半瓦当、“一化(一刀)”铜钱等。根据形制和出土文物可以断定,这道城墙始建于战国后期,两汉时又两次续修^{④8}。可惜,由于工程时间紧迫以及当时人们认识的局限,没能允许考古工作者作充分的发掘,而且这段可以作为沈阳城悠久历史见证的重要遗迹也没有保留下来,被永久地压在东亚广场(现名兴隆大家庭)下面了。

尽管如此,这段城墙的发现意义之重大是不容置疑的,它是沈阳城市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为沈阳城找到了根,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沈阳城的始建年代问题。它以确凿的第一手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沈阳城最早建于战国,而且城的位置就在沈阳老城区。沈阳故宫和沈河分局发现的文化堆积,很可能都属于城内。1997年,在沈阳故宫东侧的考古勘探中,又探出了古城北墙的东段,从而证明这道城墙的北墙长度确实在200米以上^{④9}。

依据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记载,有的学者撰文考定,沈阳古城址就是汉辽东郡十八县之一的候城县,而且把它的始建年代确定在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年)以后^{⑤0}。这一观点得到了出席1999年“沈阳建城始源研讨会”大多数学者专家的认同。

除沈阳老城区以外,目前沈阳地区发现的战国~汉代古城址还有魏家楼子城址、上伯官屯城址^{⑤1}。魏家楼子城址位于苏家屯区沙河乡魏家楼子村西北。周围丘陵起伏,城址建于沙河南岸的山冈上,城址最高处距城外地面约7米。1973年和1982年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调查。城略呈方形,南北长105米,东西宽101米,南有一门。城墙为夯土筑造,东西北三面保存较好,残高一般在3米左右,夯层比较明显,厚约10厘米左右,有的地方还留有夯窝。城内地势比较平坦,地表散布大量的绳纹瓦、陶器残片等。由探沟可见文化层厚达1.8米,地表以下为辽金文化层,1米以下为汉代、战国文化层,在汉代文化层中采集到“千秋万岁”圆瓦当、陶制骰子和二枚印章。由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可知,魏家楼子城址始建于战国,两汉及辽金都曾继续沿用过。在魏家楼子城址西南150米处还发现了一处汉代居住遗址;在城东、城南还发现过汉墓群^{⑤2}。有的考古学家依据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推定魏家楼子城址为汉代辽东郡下辖的十八县之一的高显县^{⑤3}。

上伯官城址位于东陵区汪家乡上伯官村,西距沈阳市约15公里。城址建于平地上,东面有浑河支流二道河,东侧紧邻牯牛河。该城址为南北稍长的长方形,周长约2500米。从地表观察,现城内高于城外约1.5米。城址的东侧和北侧由于河水的常年冲刷,城墙已破坏无存,形成高约6米的断崖,断崖上露出大量两汉至魏晋时期的陶片等遗物。由于村落就坐落在城址内,因此,城址的西部和南部城墙早已夷为平地,但城墙下部的夯土基础还部分保存。经实测,南墙残长326米,东墙残长约537米。从现在城址内的道路及村落房屋分布格局分析,城内原来可能有四门,形成东西和南北十字大街。东西大街在沈抚公路修筑前一直是沈抚之间的“官道”。现从道路还可大致看出东南西三面城门的位置,因北面城墙已被河水冲毁,北门位置已无法确定。城内文化层厚达1.5~2.5米,内含大量绳纹筒瓦、板瓦等建筑构件以及各种陶片等,陶片以细泥灰陶为

多,器形有罐、瓮、壶、豆、盆、甑、瓶等。1988年,在城内曾采集到一件陶量残片,上面阴刻篆书“廿六年”等字样,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兼并六国后,统一度量衡时颁发天下的标准量具⁶⁵。

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上伯官城址周围,西从下伯官村,东到抚顺刘尔屯,陆续发现许多古墓葬,有砖室墓,也有瓮棺葬,时代自西汉至魏晋,其中以东汉时期的为多⁶⁶,说明该城始建于秦汉,兴盛期主要在东汉至魏晋。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上伯官屯城址就是玄菟郡后期郡治的所在地⁶⁷。

沈阳地区战国至魏晋时期的墓葬,除了上述三座城址周围发现的之外,在东陵区汪家乡石庙子、深井子乡古城子,苏家屯区陈相屯、姚千户乡小堡屯、十里河镇红宝山等地都发现过这个时期的墓葬⁶⁸。这些地点发现的墓葬数量多寡不等,有的只有一二座,有的多达百余座。皆为砖室墓,有单室或多室,随葬品主要为陶明器,个别有铜镜、铜钱、琉璃耳珰、玛瑙珠等,时代多为东汉,晚至魏晋。石室墓仅1977年在陈相屯发现一座,位于陈相屯火车站南0.5公里的沙河南岸的台地上。墓全部为南芬页岩构筑,平面呈“丁”字形,由前廊、左右耳室、主室和侧室等部分组成,上以大石板封盖。全长3.8米,宽2.4米(不含耳室),高1.6米。墓门朝西,在门的中部立一石柱,将墓门分为左右两扇,门下横置门槛,门以三块大石板封堵。主室与侧室之间以石板相隔,主室稍宽于侧室,两室皆设有尸床,因发现棺钉,推测原有木棺。两室都发现有人骨,方向相反,侧室人骨保存较好,头东足西,仰身直肢。前廊地面与耳室陶钵内亦发现零星人骨。随葬品仅发现陶罐1件、陶钵4件和五铢钱(属东汉五铢)1枚⁶⁹。这座石室墓从墓葬形制、砌法到随葬器物都与辽阳地区东汉~魏晋时期盛行的石椁墓相近,只是规模较小,没有壁画⁷⁰,时代当在东汉晚期或稍晚。

据《史记》记载,在燕国大将秦开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的同时,沿五郡的边界自西至

东修筑了一条长城,以保护五郡不受北边部族的侵扰。以后,秦汉两朝又不断地予以修筑。经考古工作者几十年的不断调查,西部四郡的战国秦汉长城的遗迹及其走向大多确定,但辽东地区的长城却始终没有发现明确的遗迹,其走向也无法确定。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文物普查以来,在沈阳市的北部、东部和南部相继发现了新乐、上坎子、沈阳农学院后山、后山嘴子、七间房、大仁镜、珠山子、莫子山等烽火台⁷¹。今年在沈阳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后,在高坎镇又发现几座烽火台。这些烽火台皆为黄土夯筑,地面可以采集到战国、汉代的陶片和瓦片;考古工作者还清理过几座,可以确定这些烽火台属于战国至汉代修筑。它们大多位于浑河北岸,与抚顺地区发现的烽火台呈东西一线分布,它们的发现或许能为辽东战国秦汉长城的确定提供重要的线索。

四

北魏天赐元年(公元404年),高句丽乘中原多故,夺取辽东。从此辽河以东处于高句丽的统治之下,直至唐总章元年(668年)唐灭高句丽收复辽东。在高句丽占领辽东的二百余年里,是辽东地区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最为缓慢的时期。因为作为地方割据政权,高句丽一直惧怕中央政权对它的统一,所以始终把大修武备作为国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辽东地区修筑山城和千里长城。沈阳地处辽河东岸,是高句丽的西部前沿,目前在沈阳地区发现两座山城,一是塔山山城,一是石台子山城。

塔山山城位于苏家屯区陈相屯以东的塔山上,北距沈阳市25公里。塔山有东西五座山峰,西面第一峰上原有一座六角七级砖塔,故名塔山。城位于塔山顶部,南临沙河,形势险要。塔山山城早年发现,仅做过一般性的考古调查。山城平面呈簸箕形,东高西低。四周城墙沿山脊修筑,周长约1200米。修筑方法是先用石

块筑成墙基,上面再以土夯筑。遗迹至今依稀可辨,保存较好的一段是东南角,存高约1米,基础宽约3米。城东南设有一门,同时也是山水外泄的出口。城址内可见红褐色和灰色绳纹、布纹瓦,也有莲纹瓦当,都是典型的高句丽遗物。但因该城未经考古发掘且破坏严重,山城结构、布局等均不十分清楚^⑥。

石台子山城,于20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时发现。位于市区东北35公里的辉山风景区棋盘山水库北岸,原属东陵区满堂乡石台子村,所在地属于长白山余脉哈达岭的辉山丘陵。山城建于一座山丘的顶部,山下东、南两侧即临浑河的支流蒲河(现为棋盘山水库)。从1997年至2006年,考古工作者连续对山城进行了十年的考古发掘,基本搞清了这座山城的范围、结构和布局,出土文物千余件。

整座山城沿山体的自然山势修筑,西高东低,平面呈不规则的三角形,周长约1384米。城墙全部用石块修筑,基础是先清除山体表面的浮土,然后在基岩上凿出基槽,内砌长条基石二至三层;在山势陡峭之处,就直接在岩石上凿出平面作基础。墙体表面使用高句丽山城惯用的楔形石砌筑,墙里以梭形石、垫石稳固墙体,墙内填充碎石。该城还采用了拼缝、错缝技术,使墙体结合得十分严密。为了加强城墙的防御功能,在高大的墙体外侧,还修筑了九座敌台(马面),分布于山城的西、北和南面。山城共设有四座城门,每座门的结构基本相同。门道两侧墙下部砌有外凸的阶石,在门道内有深埋的门础石,门柱础石与门枢础石为台阶式的联合体。门枢础为铁铸,外方内圆,有凹窝,嵌于门枢础上。在南门、东门和北门还发现铁铸门枢套、铁门箍带、铁铆钉、碳化木门板等。在西门门道内还发现大量的碳化木柱、木板等,证明门道上原来可能有木构的门楼。西门地势较平缓,可能是出入的主要通道。

石台子山城的排水系统非常完善,由沟渠、涵洞和明渠组成。涵洞发现五处,其中三处位于门道下,二处位于城墙下。东门的排水系统由排水渠、滤沙池、沉井、

涵洞和明渠组成,甚为完备。石台子山城的蓄水设施发现于城内的山谷间,由蓄水池和拦水(滤水)坝组成。蓄水池呈直筒井形,现存深约5米,井口直径约9米,井壁全用楔形石砌筑。在已发现的高句丽山城井形蓄水池中,这是最大的一座。拦水坝位于蓄水池的西侧高处,由西向东略呈斜坡状,面向下面的蓄水池。瞭望台位于城内西南的高地上,是用楔形石围筑成“回”字形的墙体,中间填土夯实,东西长8.7米,南北宽8.5米。瞭望台外有土筑围墙,长约80米,宽约70米。

在城内地势较平坦处分布有密集的房址,已清理40余座。室内皆有取暖的火炕,烟道有石筑和土筑两种。为了防潮,有的室内地面经过烘烤。早、晚期的房址有的互相叠压、打破,反映了这座山城使用了较长时间。房址内都未发现瓦类建筑材料,说明都是草房,尚未发现等级较高的房址。出土的文物有陶器、铁器、铜器、石器、骨角器等几类。陶器主要是瓮、罐、甗、盘、盆、碗、钵等生活器皿和纺轮;除素陶外,还有带颜色的釉陶。铁器除城门上的构件外,主要是兵器,有镞、刀、斧、削、甲页等。铜器多为小件饰物,重要的是在城内地层中发现一枚隋代五铢钱。骨角器有刀柄、簪以及不知用途的有孔骨片等。石器有舂米用的石臼和砺石、石镑、纺轮^⑦。

在山城外西北方向的山沟里,还发现了同时期墓葬,已清理50余座,均属于高句丽晚期的封土积石墓。墓门基本为南向,墓室平面有铲形、刀把形、梯形和长方形等数种。有单人葬和多人葬,皆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很少,多置于头部之上,一般只有几件陶器,少见铁器和铜器,未见等级较高的大型墓^⑧。

沈阳境内的这两座高句丽山城是距离其西部边界辽河最近的两座山城,是高句丽占据辽东后,精心策划构筑的西部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均位于水陆要冲,石台子山城位于沈阳东部山区,控扼蒲河河谷,是通向高句丽内地的通道之一,也是距“高句丽西部镇城”新城(抚顺高尔山山城)最近的山城。塔山山城位于

沈阳南部山区,控扼沙河河谷,是通向高句丽辽东重镇辽东城的必经之地。两座山城的修筑时间应该在高句丽占据辽东后到隋征高丽之前。石台子山城的设计和修筑之精美以及塔山山城的土筑城垣,都体现了高句丽中晚期山城的特征和风格。另外,从石台子山城发掘的迹象看,该城先后被焚烧过两次,说明隋唐东征时曾在此发生过激烈的争夺战,山城内出土的隋五铢钱就是最好的说明。关于两座高句丽山城的城名,在石台子山城发现之前,即有塔山山城为盖牟之说⁶⁴,当时学术界似无异议,迨石台子山城发现后,始有石台子为盖牟,或为金山等几说⁶⁵,但因文献记载阙略,这个问题暂时很难定论。另外,石台子山城经过十年发掘,始终未发现过高句丽瓦等建筑材料,作为盖牟城的证据似乎不足。

五

辽代沈阳大部分地区属于东京(今辽阳)道,只有北部法库、康平境内分布的契丹贵族的头下州属于上京道。在辽朝统治的二百年间,沈阳地区的经济、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城乡相望的繁荣局面。60年来沈阳地区发现的辽代城址、遗址和墓葬等在各时代文物遗存中是数量最多的。

辽代在沈阳地区建立了许多州县,重要的有沈州、岩州、辽州、祺州、集州、广州、双州,这些州的城址现在都已发现。这些城址的城墙皆以土夯筑,四角和外壁附设有角台和马面,门外一般还有瓮城,城外一周有护城河环绕。

沈州虽然还没有发现城墙,不能确定其规模和城墙的具体位置,但从沈阳地区出土的几方石刻铭文,完全可以确定沈州就在今天的沈阳老城区;另外,沈阳故宫和沈河公安分局院内发现的辽代地层,说明辽代时这些地区都属于沈州城内。1996年,在故宫西侧的大舞台建筑工地进行考古勘探时,在地下4米左右的辽

代文化层中,发现了辽代粮仓,碳化谷物的面积达150平方米,厚度0.2~0.4米。在谷物之上有已碳化的木柱和辽代布纹瓦⁶⁶,似与沈州有关。沈州属下的岩州即高句丽的白岩城,在今辽阳市灯塔县西大窑乡石城山上。该城是座高句丽山城,依山而建,周长约2500米⁶⁷。辽州位于新民市辽河右岸的公主屯乡辽滨塔村内,城址方形,南北长320米,东西宽315米,四面各有一门。城墙虽多已坍塌,但北墙还部分地保留,西北角尚存高9米,可见当时的规模。祺州是辽州的属州,位于康平县郝官屯乡小塔子村。城址长方形,南北长340米,东西宽260米,有南、东、西三门。城墙保存较好,马面、角台、瓮城、护城河等遗迹清晰可辨。集州位于苏家屯区陈相屯乡奉集堡村。城址方形,边长500米。城墙大部破坏,城外的护城河,有的段落还保存完好,现被作为养鱼池使用。广州位于洪区高花堡乡高花堡村西约500米的农田中。城墙已坍塌,但四周遗迹尚清晰可辨。城址长方形,南北长620米,东西宽550米,马面、角台有的还存有形迹,北门还保存瓮城遗址;城内还有几处隆起的高台,是原来规模较大的建筑物坍塌后形成的。双州位于沈北新区石佛寺乡石佛寺村东北的高坡上,辽河在城址东北面山坡下自东向西流过。城址长方形,东西长370米,南北宽190米。四周的夯土城墙,除有几处被人为破坏形成豁口外,其余皆高低连续,最高处尚存高约4米。在东墙中部和西墙近西南角各辟一门,外面皆有瓮城痕迹⁶⁸。

上述沈阳地区这些辽代州县多是辽太祖、太宗时期从幽燕地区掳掠的汉人建立的,有的就属于隶宫(斡鲁朵)州,如沈州、辽州、祺州、双州。辽灭渤海后又将渤海一些州县及其民众迁到辽沈地区,遂又以渤海州县旧名命名这些州县。法库、康平属于后族萧氏的领地,分布一些头下州,渭州即法库县叶茂台镇西二台子城址,福州即法库县包家屯乡三合城城址,原州即法库县包家屯乡南土城子城址⁶⁹。

辽代佛教兴盛,在沈阳地区曾修筑过多座塔寺,沈

阳故宫东华门外还有一座辽代的石经幢(俗称大十面,现保存于故宫东路)。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这些辽塔中陆续出土了石函(石碑)等文物,为研究这些辽塔的修建历史和辽代沈阳地区佛教的发展情况提供了一批重要资料。1953年,沈阳城南白塔堡送给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一方地宫石函,函盖内外及函身外部均阴刻汉字。函盖内侧刻有“南赡部州大契丹国辽东沈州南卓望山上造无垢净光塔一所,奉为太后、仁圣昭孝皇帝、皇后、亲王、公主万岁千秋,文武百僚恒居禄位。维重熙十四年岁次乙酉癸丑朔丁时葬十月一日佛舍利讫”,其他各面镌刻参与建塔的官员、僧尼和邑人的名录130人。由此石函可知卓望山塔建于辽兴宗重熙十四年(1045年),塔名为“无垢净光舍利塔”^⑩。

崇寿寺塔,俗称白塔,位于辽代沈州城北门外,今沈河区白塔小学院内。塔为八角十一层密檐式砖塔,高约25.88米。塔身每面均有一个佛龛,中有一坐佛(四面石雕,四面砖雕),两侧各立一胁侍,上加宝盖、飞天,宝盖下砖上刻有佛名。该塔因破损严重,1956年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予以拆除。拆除时出土各类文物92件,其中有舍利子298颗。地宫中出土一石函,石函盖面和函身上均刻有汉字。石函盖面刻有“沈州南赡部州大辽国石匠作头靳士和,维乾统七年(1107年)岁次丁亥四月小书丁巳朔十一日丁卯火日,选定辛时,于州北三岐道侧寺前,起建释迦佛生天舍利塔”等文字,其他各面刻建塔主以及捐资邑众和匠人的姓名60余人。另外,装舍利子外面的铜盒盖上也刻有文字,正中为“乾统八年”,右为“佛舍利子”,左为“三月廿三日”^⑪。由石函和铜盒铭文得知,这座白塔始建于辽天祚帝乾统七年(1107年)四月,次年三月建成,历时一年。塔名为“释迦佛生天舍利塔”。铭文还记载塔的位置在“(沈)州北三岐道侧寺前”,从而证明,辽代沈州的北城墙的位置与明清沈阳城的北墙大体相同。

石佛寺塔,位于沈北新区石佛寺村七星山上,山下即辽代双州古城址。该塔为六角七级密檐式砖塔,因破

损严重,上部已经不存,现只存南、东南和西北三面塔基及部分塔身。1982年该塔地宫被人撬开,随后文物工作者进行了清理。发现在地宫中放置一石函,两侧各立一小石碑。两碑两面及两侧面皆刻有文字。碑文记载了参与或捐资建塔的官员、僧尼、百姓、工匠等230余人。根据碑文,可知该塔为双州时家寨净居院塔,建塔时间是辽道宗咸雍十年(1074年)七月^⑫。

沈阳塔湾塔,是辽代沈州境内现存最为完好的一座辽塔,位于皇姑区塔湾街。这是一座典型的辽代八角十三层密檐砖塔,高约33米。1985年,文物部门在维修该塔时,在中宫和地宫中发现壁画以及各类文物100余件。最重要的是地宫中发现的石函,除石函底面外,各面都刻有汉字铭文,共计5000余字。包括“建塔缘由”及参与建塔各界人士题名,共计有一千余人,包括官员、僧人、城乡民众。官员从沈州昭德军节度使耶律庶几到中下级官员;还有在外地做官和已经退休的官吏^⑬。由铭文得知,这座塔亦名“无垢净光舍利佛塔”,塔内葬佛舍利1546颗,下葬时间在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四月十五日。

新民辽滨塔位于新民市辽滨塔城址(辽州)西侧,亦为密檐式十三层仿木结构砖塔。1993年维修时于塔之三宫(天宫、中宫、地宫)内出土舍利子及装藏的各类文物108件(组),其中天宫发现梭形石碑一通,碑阳刻“大邑长始平军节度使金吾卫大将军开国公耶律贞上魏孝冲史惟民刘□□哥□□□□上李孝贞侯辅君张惟志刘要福上侯卞郭寺家郝水哥汪兴哥”;碑阴刻“都维那大国舅相公萧□上寺承张堆大校高辅郭名伦上地主李颀裕仙郭如仁法师了中上塔主运贞乾统十年正月一日初起上塔米到四百五寸”;碑侧刻“天庆四年八月一日毕”^⑭。由此碑可知,辽滨塔始建于乾统十年(1110年)正月一日,天庆四年(1114年)八月一日修竣,历时四年有余。

上述五座佛塔皆修筑于辽兴宗、道宗、天祚三朝,这是辽代中后期,佞佛之风极盛的绝好证明。从其出